



农业学大寨

山西人民广播电台编

山西人民出版社

农业学大寨

任河东

編 者 說 明

大寨，是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樹立起來的一面閃耀着毛澤東思想光輝的紅旗。英雄的大寨人，在陳永貴同志帶領下的大寨黨支部的領導下，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以階級鬥爭為綱，與天鬥，與地鬥，與階級敵人鬥，與自己頭腦里的“私”字鬥，與中國赫魯曉夫在农村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鬥，千鬥萬鬥，鬥出了一個“公”字，把窮大寨鬥成了富大寨，把舊大寨鬥成了新大寨。大寨已經成為我國五億農民建設社會主義新农村的光輝榜樣。

一九六四年，偉大領袖毛主席向全國人民發出了“**農業學大寨**”的偉大號召，幾年來，特別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展以來，全國億萬人民公社社員、革命幹部，認真地全面地落實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學大寨人，長大寨志，興大寨風，走大寨路，掀起了更加廣泛、深入、扎實的農業學大寨的群眾運動。大寨精神正在全國各地開花、結果。

為了宣傳好大寨精神，我台從一九六七年二月開始舉辦了“**農業學大寨**”專題節目。這個節目受到廣大農民和幹部的熱烈歡迎，並要求將其內容編印成冊。為了滿足大家的需要，現將“**農業學大寨**”節目中已經廣播過的陳永貴等十個同志的講話稿匯編出版，供同志們學習。

由於我們毛澤東思想學得不好，對大寨精神理解得很不夠，整理和編輯中的缺點、錯誤一定還不少，懇請讀者批評指正。

山西人民廣播電台

目 录

- 一、大寨人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
 - 阔步前进……………陈永贵 (1)
- 二、学习毛泽东思想要在“用”字上
 - 狠下功夫……………郭风莲 (34)
- 三、既当干部又当社员 永保劳动人民
 - 本色……………贾承让 (51)
- 四、大寨党支部用毛泽东思想
 - 教育我们干革命……………梁变良 (69)
- 五、大寨妇女在毛泽东思想
 - 哺育下成长……………宋立英 (84)
- 六、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三大革命运动…贾来恒 (92)
- 七、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建设新大寨的
 - 强大的思想武器……………贾进才 (104)
- 八、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大寨妇女……………郭爱莲 (113)
- 九、用毛泽东思想培养教育最小的
 - 一代接班人……………贾存锁 (118)
- 十、发扬光荣传统 在农业战线上
 - 立新功……………石桂林 (126)

—— 毛 主 席 語 录 ——

农业合作化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严重的思想的和政治的斗争。每一个合作社，不经过这样的一场斗争，就不能创立。

《严重的教训》一文的按语

大寨人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 阔步前进

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 陈永贵

(一)

过去的大寨是个什么样子的的大寨呢？是人穷、地穷、村子穷。人穷，贫下中农多，在外地扛长工、打短工、讨吃要饭的多，贫下中农占百分之七十以上。地穷，这里没有平地，更没有梯田，是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种地，产量很低，亩产不过百斤左右。我们大队近八百亩土地，在解放前每年总产一般是七、八万斤，最好的年分产过十万斤，这就是“大丰收”了。村子穷，村里连好房子也很少，大部分是些土窑洞，树木也很少，也没有什么特产，交通也不方便。那时不只全国不知道大寨，就连昔阳县离这里三、二十里的地方，也不知道有个大寨。我们的大寨，过去就是这三穷。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大寨穷，就要变。现在不是过去的大寨了，全国人民都叫我们新大寨。我们也感到新。当然，这并不是我们骄傲自满了。虽然我们作出了一些成绩，我们认为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即使有点成绩，那也不是我们大寨人有那么大的干劲，或者大寨的干部就有那么多的办法，不是的。这是大寨的贫下中农最爱读毛主席的书，最爱听毛主席的话，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结果。

一九六四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伟大号召，极大地鼓舞了大寨人。大寨人不辜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希望，日日夜夜，艰苦奋斗，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大寨就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大寨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不把过去的大寨讲清，同志们就不可能理解了。过去的大寨是：“山大石头多，出门就爬坡，地无三尺平，年年灾情多。”过去大寨的土地，既无沟坝地，也没有梯田，大部分土地都在山坡上，七沟八梁一面坡，加上坡度又大，水土流失十分严重，地面越种越少，土层越种越薄，当然就谈不上高产了。种地要土嘛，如果土层越种越薄，不仅产量低，而且既不抗旱，也不抗涝，那怎么能种好庄稼呢？

要改造土地，在旧社会是办不到的。我们在一九四六年组织了互助组，劳动虽然互助，但是生产资料还不能够集体使用，计划还没有统一制定。因此，还不能够改造大寨的贫困的自然面貌。当时虽然有了互助组，但困难还是很多的，首先是劳动力的困难，人的因素第一嘛。全村只有十多个全劳力，其余都是儿童、老汉和妇女。我记得一九四〇年

日寇杀死了我村四十多个青壮年。当时大寨只有六十多户，那几乎是每户平均杀了一个劳动力。一九四五年解放后，全大队贫下中农的子弟，为父兄报仇，又有二十六个青壮年报名参军。劳动力很少，走组织起来的道路，就能克服缺少劳力的困难。当时村里组织了两个互助组，一个叫“好汉组”，就是我们大队以富裕中农为主的那十多个强劳力组织起来的。一个叫“老少组”，是留下的老的、小的，虽然分到了土地和房屋，但在生产上还有困难，老的最年轻的六十岁，小的最大才十六岁，就是这样四户老汉，五户娃娃，和我共十户组织起来的。这两个互助组一建立，就开始了尖锐、复杂的斗争。“好汉组”的人同地、富、反、坏勾结在一起，说什么：“家有半升粮，不当孩孩王。”“孩孩王”就是指我说的。我们“老少组”也有自己的志气，我们都是贫下中农，都是阶级弟兄，有阶级感情。我们最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号召我们组织起来，我们就组织起来。而他们却说：“你们老的上不了马，小的拉不开弓，那可有好戏看哩。”我们说：“老的有经验，小的会长大，只要听党话，路子走不差。”“老少组”和“好汉组”来了个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不断在“老少组”里挑毛病，抓辫子，散布流言蜚语，进行破坏活动。但都被“老少组”顶住了。“老少组”不但没有被压垮，反而越压越硬。虽然我们是老的、小的，但生产并不比他们次。论农活比他们完成的早，按产量比他们的高。“好汉组”他们劳力好、耕畜好、农具好、土地好，他们占有“四好”，我们“老少组”是“四劣”。他们占有“四好”，但不等于思想好；我们“四劣”，首先我们思想好，听毛主席的话，听党的话，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高。我们劳力弱，但干劲大，农活好，产量高。这样斗了一

年。一九四六年一年比下来，“老少组”不仅没有倒，反而越硬，越巩固，越团结了。那个“好汉组”大家叫他们是“明互助，实单干”，“春来，夏散，秋不见”。结果，他们垮台了。秋收以后，他们分散出来要求报名参加我们的组。当时，思想好的我们就吸收他们入组，我们很主动。大寨就是以“老少组”为基础成长起来的。从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九年，互助组不断发展壮大，由十户发展到四十九户。从一九五零年起，我们着重巩固提高，给办农业合作社创造了条件。

一九五二年，我们要求办社，但没有被批准，说我们大队没有文化人才。说：“不要早办”，“办得慢一点好”，“就是办起来也有困难”，所以没有批准。一九五三年县里才批准我们办农业社。我们是四十九户的互助组，但县里只批准办三十户的，这又给我们出了难题。我们互助组有四十九户，要只让三十户入社，就要有十九户退出搞单干。该让那些户出去搞单干呢？我们开了几次会，动员十九户社员退组，但是都不愿退。因为我们这四十九户的互助组已巩固多年啦，大家都尝到组织起来的甜头了，都愿意参加农业社。为什么不批准我们办四十九户的农业社呢？为什么害怕农民走组织起来的社会主义道路呢？这个问题，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不清楚。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才知道，中国赫鲁晓夫最害怕农民组织起来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办初级社，办大社，对他们复辟资本主义是很不利的，这一点我们现在是清楚了。我们怎么办？当时我们闹了两本眼，明三十户，暗四十九户，准备犯“错误”，挨批评。

初级社刚一成立，就显示了集体经济的无比优越性。一

九五三年全社亩产二百四十斤，而互助组才一百八十斤，单干户只一百六十斤。秋收以后，我们一方面召开农业社的庆丰收大会，一方面搞统购。当时我们全大队统购任务一共是四万两千斤，由农业社、互助组和单干户共同负担。在庆丰收大会上，有些地、富、反、坏不承认我们农业社的产量高，他们胡说：“你们产二百四十斤，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我们单干户一亩能产三百斤，优越性比农业社还要大。”他们在庆丰收大会上就这样明目张胆地破坏农业社。那也好，我们就把庆丰收大会改成统购大会。既然农业社、互助组和单干户都大丰收了，那统购任务一定会超额完成的。于是便宣布统购任务。一提这，这些坏家伙就变了口，他们自己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自己打自己的嘴巴，说：“我这是坏嘴，屁眼嘴，没有产那么多的粮食”，“我是和农业社搞对立啦”，“我原来不知道有统购，要知道有统购，我死也不敢说三百斤粮食，我们实产才一百五十斤，连秸秆过秤也没有三百斤”。在庆丰收大会上，暴露了那些地、富、反、坏反对和破坏农业社的阴谋，也暴露了他们的底子。他们在事实面前不得不低头认罪，说他们犯了错误，要求宽大。我们给他们落实了产量。虽然互助组、单干户占全大队土地面积的一半，应分配给他们两万斤以上的任务，可是他们的产量低，只给了他们一万二千斤的任务，其余三万斤的征购任务由我们农业社负担，实际我们完成了三万三千斤的征购任务。我们用这些事实教育了广大贫下中农，富裕中农也报名入社。我们的互助组和农业社是经过尖锐、复杂的斗争走过来的。我们的亲身体会是这样：在农业上种地，我们是寸土必争，见缝插针；对阶级敌人斗争，我们是寸步不让。

一九五三年冬季，我们党支部制订了一个十年造地规划，我们要用十年时间，把大寨七沟八梁一面坡彻底改变。这本是一件好事。但是，地、富、反、坏却竭力破坏和反对。我们要改造山坡地，他们却说什么：“修梯田，用工多，时间长，何时能修起？”我们要把七条干河沟开成良田，他们又说什么：“人有人道，水有水道，人不和水斗，鸡不和狗斗，人有多大本领，敢同龙王爷搏斗啊！”

这也不奇怪。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阶级敌人这样起劲地反对我们，更加证明我们的十年造地规划提得对。贫下中农经过讨论，揭穿了那些阶级敌人的破坏阴谋，批判了阶级敌人的胡说八道，更加坚定了完成十年造地规划的信心和决心。大家认为，地变，产量变，首先得人的思想变。大家说：“我们不怕时间长，也不怕费工多，一年修不起，就两年三年，我们这辈子修不起，还有子孙后代。”到一九六二年，终于完成了十年造地规划。把七条干河沟都变成了良田，把山坡地都改成了水平梯田，有土的地方我们打了土坝，有石头的地方我们垒了石坝。全大队除留下“教育田”外，都改造成为良田。地变，产量也变，由过去亩产不过百斤左右，到一九六四年达到八百零九斤，现在达到九百多斤。由过去全大队总产不超过十万斤，现在达到六十四万斤。产量高了，我们对国家的贡献也就大了。一九五三年时，我们全大队才提供四万五千斤商品粮，一九六〇年上升到二十四万斤，最高达到三十万斤，平均每年二十五万斤。社员口粮也增加了，生活也提高了。一九五三年，全大队每人平均口粮二百六十斤，现在每人平均吃到五百斤，几乎比一九五三年提高一倍。

我们是怎样改造和整修土地的呢？我们大队的劳力不多，只一百三十多人，连辅助劳力参加出勤的人数总共一百五十来人。要搞土地基本建设，还要搞田间管理，农林牧副都要占劳动力，所以我们改造土地主要是在冬季搞得多，不管下雪也好，地冻三尺也好，在零下二十二度也没有停工。过去我们扛长工，冬天没活干了，这叫冬闲。可人闲肚也闲，地主在冬季不要你了，我们就人闲肚也闲了。成立农业社以后，把冬闲变成冬忙，只有冬天忙，秋天才能多打粮。冬天是整地的大好时机，地里没有庄稼，也没有其它活的影响，就是一个整地。尽管天冷地冻，但社员人不冷，心不冻，零下二十二度也坚持整地。贾进才同志在整地当中，零下二十二度，天不明就拿起石匠工具到工地。社员给他挑来早饭，都冻成冰凌渣了，他拿起筷子一搅，吃在肚里猛劳动一阵，出一身汗，就啥事也没有了。这就带动其他社员上去了。大家干劲很大，信心很足。整地不是说一句话，得下硬功夫哩。这硬，那硬，没有毛泽东思想硬，只要掌握了毛泽东思想，什么困难也挡不住我们。

经过十多年的艰苦奋斗，经过十多年来大量整修土地和水土保持工作，把坡地改成水平梯田，把河滩变成稳产高产、旱涝保收的良田，把小块地并成大块地。全大队七百九十六亩耕地，原来有四千七百多块，现在并成一千八百多块。这里是高寒地区，过去十年九旱，不仅地里缺水分，二十天不下雨，就连人吃水也很困难，可是一九五三年办起农业社到现在，从没有缺过水。一九六〇年伏天大旱四十天，我们的水井水位也没有下降。为什么呢？因为土地加工以后，水土不再流失了，增加了活土层，又可以多蓄水，也就增加了地下水。过去我们这里是“三天没雨苗发黄，下点急

雨土冲光”，“山西种地，河北肥田”。现在一块块梯田都把它挡住了，一道道河坝都把它拦住了。上边又有水库，洪水灾害减轻了。现在我们大寨的肥土再也流不去河北了。我们大队劳力不多，活可不少。我们深深体会到，没有人的思想革命化，没有人的革命干劲，是不可能改变穷山恶水面貌的。

（二）

一九六二年完成造地规划以后，一九六三年就制订了一个亩产“过长江”的规划。社员对实现这个规划信心很足，干劲很大。可是在一九六三年八月初，一连降了七天七夜的大雨，把我们十多年来苦心经营的土地一下给冲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土地和房屋受灾，大家情绪受了影响，感到没有办法。这确实是几百年不遇的一场毁灭性的灾害。阶级敌人无空不入，也趁机散布流言蜚语，他们说：“大寨不能住了，种地没地，住房没房，只有逃荒去吧！”

怎么办？我们是躺到国家身上，依靠救济过日子呢？还是按照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坚持自力更生来战胜自然灾害呢？我们向毛主席著作请教，从毛主席著作中找办法。全大队开展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以往我们也学，但没有一九六三年学的那么多，那么普遍，用的那么活。学了以后，大家有了勇气，坚持自力更生去战胜灾害。大家说：“地是人修的，房是人盖的，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我们都能办到。”我们不管那些地富反坏怎样破坏，我们有自己的打算，不要用五年时间就能恢复土地，十年就能修好房屋。

这时候，国家派来了慰问团，看了灾情，连续四次给我

们带来了救济。第一次，救济医药费，我们谢绝了。为什么？党、团员在抗灾当中舍己为公，受伤的很多，就说贾承让吧，他住的窑洞塌了，把女人和小孩都隔在里面，可他顾不得救，先救社员的生命和财产。共产党员就应该这样做，首先是为群众利益着想，不应该为自己着想。我们这里七天七夜下暴雨，受了伤的人，我们自己拿出钱来治疗，救济的医药费，给了兄弟队。受灾后，没房住，人都坐在一起，人畜同居，慰问团的同志们看到这种情况，拨来苇席，我们说，我们自己有钱买，也有苇地，自己也会编席，把苇席让给兄弟队吧，我们也没有要，这是第二次。第三次救济寒衣，第四次救济我们恢复土地和修建房屋的款，我们都没有要，也让给兄弟队了。

连续四次救济我们都没有要，要什么呢？我们要毛泽东思想，有了毛泽东思想就有了一切。我们是坚持自力更生的，我们决心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来战胜灾害。如果要了救济，就不能在困难中锻炼广大社员，尤其是青年一代，同时也不能显示集体经济的无比优越性。我们大寨的青年多，大都是有文化的，但他们都是富生富长，吃蜜糖长大的，没有受过什么艰苦。一九六三年遭了毁灭性的灾害，正是个锻炼的好机会，让他们在困难的情况下锻炼和成长起来，接好革命的班，使他们在接班以后，遇到困难就自己起来战胜困难，绝不被困难所吓倒。当然，地、富、反、坏要出来破坏，但是，破坏我们也不怕。广大社员在一九六三年受教育很大，坚持自力更生，不要救济，依靠集体力量，依靠人的因素，就是依靠毛泽东思想去战胜灾害。使敌人无空可钻。同时，我们也要考虑到培养社员勤俭节约的好习惯。花自己的钱，能少花的可以不花，能多花的可以少花，养成勤俭节约习惯。

对待国家救济，我们发动社员经过反复讨论，大家认为：日子过的好，不是依靠国家救济，更不是依靠兄弟队支援，只有依靠自己勤俭过日子，自力更生，才是光荣的。如果依靠国家救济来提高生活，那还不是损了大集体，肥了小集体；如果依靠兄弟队支援，那还不是损了别人的集体，肥了自己的集体。坚持自力更生，更能考验和锻炼我们的干部。教育他们遇到困难要挺身而出，在困难当中要想办法克服困难，战胜困难。我们连续四次不要国家的救济，遭到阶级敌人的反对和破坏。他们诬蔑我们是“傻瓜干部”，这更使广大贫下中农社员认识到被敌人反对是好事不是坏事的道理。不管敌人怎么反对，我们的立场是很稳的，贫下中农的思想是不会动摇的，有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更加坚定了广大贫下中农战胜自然灾害的决心和信心。

(三)

一九六四年的大丰收引起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大反对。他们在大寨搞假四清、真复辟。他们首先清我们的土地。我们从一九五三年就大造土地，难道土地能越搞越少？我们没想到这大造土地还犯罪。他们借“四清”机会妄图把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树立起来的大寨这面红旗砍倒。一九六四年他们调集省、地、县、社、队五级干部来丈量我们的土地。这大队一级就是大寨临近大队的干部，是叫这些队干部来看，那块是大寨的地，那块不是大寨的地。他们说大寨隐瞒了土地。我们大寨多年来就是八百零二亩土地，一亩地打八百多斤粮食，他们不相信。不承认产量多，就是不承认集体经济的优越性。说什么：“谁能知道他们是一个八百零二亩，还是几个八百零二亩？”他们丈量了五十多天，量了再

量，量来量去，无非是不承认大寨产量高。贫下中农对此非常气愤。大寨贫下中农为了整修土地，在数九寒天，两手都裂出缝来。他们这样做，就是不承认大寨人的辛勤劳动，就是不承认大寨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当然更不承认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弄不清这个问题，现在闹清了，他们是准备丈出几个八百零二亩来，把大寨打成假红旗。结果连一个八百零二亩也没有丈出来，实际是七百九十六亩，比我们报的还少六亩。

一计不成，再生一计。他们又说，“大寨卖余粮多，几十户人家，几百亩地，一年就卖给国家二十多万斤余粮，一定有假。”他们把粮食局的账拿来，上下核算。我们每年卖给国家二十几万斤粮食，斤两不短。他们又没有捞到稻草。于是，又说我们分配上有问题：“不仅没有执行政策，违犯了政策，你们还要制订政策，这简直成了‘小中央’。”我们的粮食分配，从一九五三年到现在，一直是实行以人定分配的，他们反对我们这一条，说我们没有平均分配。说什么：“全国各地都是按人口分配粮食，你们为什么要以人定分？”这一下可抓住了。我们不承认是违犯政策，我们是正确执行了毛主席的政策，没有执行中国赫鲁晓夫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政策。我们不是为了分配而分配，而是为了更能促进生产。如果要按人头分配，我们认为是不切合实际的。我们有些社员，一户有三、四个娃娃，还有的一户七、八个娃娃，有的连一个娃娃也没有，全家尽是大口，都是劳动力。我们以人定分，切合实际进行分配，加强了劳动力，更能促进生产，这就犯了罪？不能承认这是犯罪，这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当然，没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也不敢这样说。通过辩论，我们始终认为是对的。我们每天都

同社员一起劳动，难道我们不知道这强劳力要吃多少粮食，娃娃们饭量小？难道我们连主次也不清楚了？我们也不是作官当老爷，我们也没有脱离开群众，脱离开实际。这一条他们又没有弄住。于是再搞，又说我们粮食没有扣水分。我们从一九五三年办社到现在，确实没有扣过水分，我们打三十万就是三十万，打五十万就是五十万，这又犯了罪？他们说：“你们这个假红旗，怪不得你们产量高，社员吃粮多，原来你们不扣水分嘛。”因为我们的粮食都晒干了，本来就没有什么水分可扣。我们不能承认这是犯了罪，我们从来也没有隐瞒过一斤粮食，我们是实事求是的。你们硬要这样往下扣，那么，这集体经济还有什么优越性呢？他们这样搞，是长了敌人的志气，灭了自己的威风，我们反对。

在一九六四年的“四清”运动中，他们不是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搞社会主义教育，他们执行的就是所谓“桃园经验”，光在我们大队学“桃园经验”，就学了二十多次。两个月时间，没有让我们大队的贫下中农学过一次毛主席著作。他们说什么：“大寨大队旗杆里面生了虫虫，这些虫虫捉不掉，大寨红旗举不高。”我们认为虫虫不是我们大寨人，而就是他们，他们是镇压革命群众的害人虫。后来，党中央派来工作队，同我们大队贫下中农一起，把原来的四清工作队赶出大寨。中央工作队，经过一个多月的了解和工作，肯定我们是“四清”单位。通过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闹清楚了，一小撮党内走资派，千方百计反大寨，就是因为大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高，对他们复辟资本主义不利。大寨贫下中农是紧跟毛主席的，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

尽管我们每年增产增收不少，但我们没有大吃大喝，没

有多花钱，我们总是要勤俭办社，勤俭办一切事业，勤俭持家。在一九五七年，宋立英同志带上妇女们进城赶“八一”庙会，走时从家带了一些窝窝头，到了会上有的队社员吃的是馒头，看到我们吃糠面窝窝头，就说：“你们不是先进队吗？不是产量高吗？为啥赶会还吃窝窝头，连个烧饼也买不起？”当时，宋立英同志感到给大寨人丢了脸，受了人家讽刺了，没有赶完会就回到了大寨。她很生气，认为这次节日过得不光彩。对于这件事，我们全大队贫下中农进行了讨论，大家认为她不是给大寨人丢了脸，是给大寨人更长了志气，给大寨人争回光来了。我们打得多，不等于要吃好，我们收入多，不等于要多花。我们省吃俭用，不是羞耻，而是光荣。我们省吃俭用不是为了别的，是为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为了支援世界革命人民的革命。要说我们吃好的，比他们赖不了，我们不仅可以吃烧饼、吃馒头，吃点心也吃得。多年来我们始终注意了节约，勤俭过日子，如果我们要不是采取勤俭办队，勤俭节约的方针，那为什么一九六三年遭到毁灭性灾害以后，连续四次不要国家救济呢？当然，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实现了思想革命化。同时我们还有物质基础，我们从办社以来，每年积累在百分之十五到二十以上，如果收多少，就分多少，那么，集体经济不就成了一个空架子吗？集体经济应该有较大的公共积累，这样，遇到特殊情况和自然灾害，就能够不向国家伸手，求救济，就更有利于发展生产。现在大寨有储备粮，有较大的公共积累，社员百分之九十的户在银行有存款，我们就能够战胜象一九六三年那样的毁灭性的自然灾害，不给国家增加负担，就能够提出“三不要”（不要粮，不要钱，不要物资），“三不少”（征购不少，积累不